

# 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

• 王中江

為了解決中西文化的衝突，調適二者的關係，中國近代以來所採取的辦法或態度，一般被統攝為三種：即復古派、西化派和折衷派。在這三種路徑中，復古派雖總有所表現和張其目者，但基本趨勢是逐步走向式微，而西化派與折衷派的競爭消長則佔據着中西文化衝突的主要陣地，且持久不衰。30年代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其實質也就是西化派與折衷派之間在中西文化問題上的對立和衝突。

## 一 西化與本位文化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成為論戰發生的直接誘因。這個〈宣言〉口氣很大，聲稱要對幾千年來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作一個總的清算，同時提出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總設想和總原則。其主要之點有三：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既不讚美，也不詛咒。要進行檢討，發揚好的，淘汰壞的。二是對西方文化，只吸收應當吸收的，反對全盤西化。三是建設中國本位的文化<sup>①</sup>。單從這些原則看，〈宣言〉也許沒甚麼錯。但何以會受到西化派的激烈批評呢？

胡適是對〈宣言〉作激烈批評的代表，他的批評圍繞着〈宣言〉的三個問題而展開：即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如何對待本位。

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十教授的說法是「不守舊」，「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從學理上看，這種態度不易推倒。胡適揭發〈宣言〉的「言外之意」，他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不守舊」，而實際上正是守舊心理在作怪。他們為了掩蓋

30年代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其實質也就是西化派與折衷派之間在中西文化問題上的對立和衝突。

這種守舊心理，於是就打出折衷調和的旗號<sup>②</sup>。如果我們把視角轉換到胡適與本位文化派如何評估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的對立也許更加明顯。胡適儘管對傳統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也有所肯定，但從整體上看，他是強調傳統文化的負面性、消極性和劣根性，並採取批判和超越的態度。與此不同，本位文化派對傳統文化則是作更多的肯定和認同，反對過多的批判和否定。因而當胡適把十教授的「不守舊」說成是復古、保守時，十教授除了為自己正名外，他們就把對胡適的批評轉到胡適過多地否定傳統上，並把這一批評擴展到西化派的整個方位上。

從本位文化派與胡適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同，很容易推出他們將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就本位文化派來說，他們承認西方文化的積極價值，因而要求吸收歐、美文化，但他們對西方文化有強烈的批判意識，認為西方文化也有許多缺點，不能全盤接受，要有所選擇<sup>③</sup>，應「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sup>④</sup>他們說胡適的錯誤就在於對西方文化的毛病視而不見，而一味地讚美。說到胡適，他真正關心的不是西方文化有沒有缺點，而是強調它的許多優點，主張大力學習<sup>⑤</sup>。應該拚命走極端，走「全盤西化」<sup>⑥</sup>、「充分世界化」<sup>⑦</sup>，所謂「取法乎上」，經過打折扣後，走到「得乎其中」的地步<sup>⑧</sup>。由此來看，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只能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最終目的。他與陳序經不同，陳肯定西方文化都是好的，又認為文化是一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整體，要學就必須全盤而不能選擇<sup>⑨</sup>。

本位文化派與西化派爭論更激烈的是「中國本位」。甚麼是中國本位？十教授在宣言中沒有作出明確界說。從他們憂患中國文化喪失了中國的特徵這一點看，他們所說的中國本位可以理解為中國特徵；從他們強調中國時空的特殊性和此時此地的需要來看，他們所說的中國本位，似乎又主要是中國的現實目標。但中國的特徵、此時此地的需要、中國的現實目標究竟是甚麼呢？大家都有不解之感，要求十教授作出具體說明。在〈我們的總答覆〉中，十教授指出此時此地的需要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針對十教授「中國本位」的上述觀點，西化派的批評是多方面的。王西徵指出，十教授的此時此地需要，其實質是取消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而代之以「二民主義」<sup>⑩</sup>。張奚若很看重王西徵的這種揭示，他指出：「更透徹的講，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獨裁政制建設運動！」<sup>⑪</sup>胡適的批評則集中在「中國本位」的保守性上，他認為十教授的「中國本位」就是中國傳統。胡適說，今日中國文化最可憂的，決不是十教授所說的在一切領域中都失去了中國的特徵，而是中國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正是因為這些特徵，西方的良法美意，到了中國就都成了逾淮之橘。他說：「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sup>⑫</sup>把胡適所說的「中國本位的文化」與十教授所要求的此時此地需要的「中國本位」比較一下，應肯定的是胡適而不是十教授。在充分學習西方文化之前，就談論甚麼「中國本位」、「中國特色」，不管說得如何動聽，都不能掩蓋排拒西方文化的真實動機。事實上，現代中國對西方文化所出現的一次次排斥，大都是在「中國特色」的名目之下進行的。

針對十教授「中國本位」的觀點，西化派的批評是多方面的。王西徵指出，十教授的此時此地需要，其實質是取消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而代之以「二民主義」。張奚若指出：「更透徹的講，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就是獨裁政制建設運動！」。

在充分學習西方文化之前，就談論甚麼「中國本位」，「中國特色」，不管說得如何動聽，都不能掩蓋排拒西方文化的真實動機。事實上，現代中國對西方文化所出現的一次次排斥，大都是在「中國特色」的名目之下進行的。



圖 本位文化派主張文化選擇，同時還提出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指導這種選擇。

## 二 文化選擇與科學方法

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之爭，不僅在於對中西文化能不能加以選擇，而且還在於科學方法能不能作為選擇的標準。本位文化派主張文化選擇，同時還提出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指導這種選擇。與此相反，胡適強調：在優勝劣敗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沒有甚麼標準可以用來選擇文化，政府不能做文化的裁判官，科學方法在此也無能為力<sup>13</sup>。

針對胡適的觀點，本位文化派作出了反批評。何炳松根本不承認文化有優劣之分。但他又提出了文化的「適者生存」說，認為文化的盛衰存亡完全取決於能否適應環境<sup>14</sup>。這樣，他實際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李劍華的批評集中在胡適的「優勝劣敗論」上。他說胡適的「優勝劣敗論」是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解釋人類的社會生活歷程，是用自然的規律性去代替社會的規律性，機械地把社會還元於自然<sup>15</sup>。照李的看法，中國近代以來所以不斷地遭受災難，並不是由於我們的「劣」、我們的「不適應」和我們受「自然淘汰」的作用，而在於外來力量對我們的壓迫。胡適的錯誤就是忽略了這種壓迫，而把它歸之於「優勝劣敗」的生物學法則。

李劍華強調科學方法可以作為文化選擇的標準，把科學方法對文化選擇的指導作用變為政府可以對文化實行統制。

對胡適反對用科學方法作為文化選擇標準的看法，本位文化派的批評更集中。何炳松質問胡適說，為甚麼不看一看世界歷史的事實：大從影響世界的實業革命，小到一國的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無一不與科學方法的指導有關<sup>①⑥</sup>。在此，何是從科學方法萬能論出發來質問胡適的。但科學方法是否真有那麼廣大的效力，何就不管了。李劍華也提出了批評。他對胡適這位信仰科學的人而不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指導文化各方面的選擇感到驚異，強調指出科學方法可以作為文化選擇的標準。但李進而論述的不是科學方法如何指導選擇，而是把科學方法對文化選擇的指導作用變為政府可以對文化實行統制<sup>①⑦</sup>。那麼國家對文化的統制是否要以科學方法為標準或建立在科學方法之上呢？政府應該統御文化的觀點，顯然不可取。這不僅因為文化是十分複雜的現象，政府根本統御不了，而且即便是能統御，這種統御的結果只能是阻止文化的多元發展。因而在這一點上，胡適是對的。另一位胡適的批評者叫王南屏，他也許把討論變得具體一點。王先是承認胡適「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的說法，然後他質問說：胡適認為「婦女放腳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為合理的事」，這裏的「公認」、「合理」來自何處呢？「這是不是因為『纏足』，依據科學的說明，是有妨礙生育的發達呢？這種『合理』是不是以科學為標準呢？」但胡適對以上的所有批評，都沒有作出答覆。因而文化選擇與科學方法之關係的爭論只能是不了了之。

### 三 文化與創造

建設和創造的提出，並不始於本位文化派。當嚴復對傳統和舊秩序的破壞而新的又未建立深感困惑之際，梁啟超已把破壞和建設的關係問題提到了他的思考之中。孫中山通過革命的親身體驗，也得出了建設難於破壞的結論。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的危機，並未解決。中國文化的重建，於是就顯得更為迫切和需要。因而從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它不斷地被提及。1935年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則把中國文化的建設的和創造更加突出出來<sup>①⑧</sup>。

但是，十教授提出的建設和創造，又表現為自大主義，這使西化派感到反感。張佛泉的反感比較典型。他說十教授論創造的一類話，「只不過是犯了夜郎的誇大狂。」<sup>①⑨</sup>胡適是反感者之一，他批評十教授說：「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sup>②⑩</sup>對胡適的這一批評，十教授並未作出反批評，而作出反批評的則是一位旁觀者范任。照范任的表示，他對十教授的宣言並不是完全贊成的，但在創造一點上，他是「絕對同情於十教授而反對胡適先生」<sup>②⑪</sup>。

但是，如果認為胡適完全反對文化的建設和創造，那也不符合事實。1919年12月，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在此胡適提出了「再造文明」的觀念，指出新文化運動是通過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等環節，再造中國文明。1930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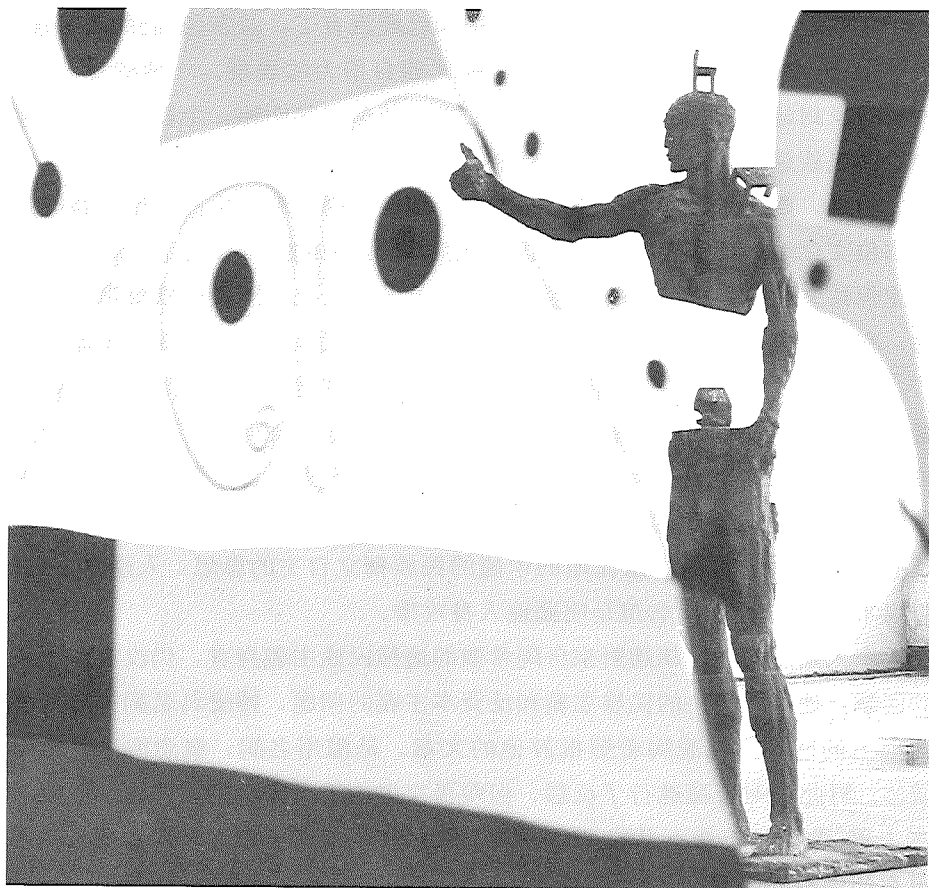


圖 胡適深深感到中國文化的復興除了學習模仿西方文化外別無他途，而這又是一個逐步的連續過程。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自序》)一文中，胡適又重述了他的「再造文明」觀念。胡適所說的「再造」，雖不能與「創造」等量齊觀，但也不能說二者有根本的差別。1934年，胡適與壽生等人就「信心」問題展開討論。這一討論，涉及到了「創造」問題。針對壽生把創造性與接受性對立起來的觀點，胡適提出了反論，認為接受、模仿與創造是統一的<sup>②</sup>。胡適這樣做並不奇怪，漸進論和中國文化落後論的二重思想，使他深感中國文化的復興除了學習模仿西方文化外別無他途，而這又是一個逐步的連續過程。

文化的建設和創造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難局之一。追尋這種難局的根源，以下幾點是應該注意的：一是至今我們還不能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係，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仍深深陷在惡性循環中；二是政治上奉行文化專制主義，使文化不能呈現多元局面；三是文化的建設和創造停留在討論上，而沒有把它轉換成具體的操作過程。顯然，創造只能在創造過程中實現。

#### 四 文化與民族意識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中華民族陷入了深深的危機之中，二十世紀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使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再次被激發。這也反映在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戰中。

如果認為胡適完全反對文化的建設和創造，那也不符合事實。1919年12月，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在此胡適提出了「再造文明」的觀念，指出新文化運動是通過輸入學理和整理國故等環節，再造中國文明。

十教授在〈宣言〉的開頭就指出，中國已經沒有了，並在〈我們的總答覆〉中強調說：「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必然使命。」很明顯，十教授是要把文化建設與民族意識、民族救亡對應起來。

但是，西化派對此的反應是遲鈍的，他們本應圍繞文化與民族意識的關係與本位文化派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但遺憾的是他們大都沒有這樣做。張佛泉否定保持文化特色與救國的對應關係，也不承認文化認同與民族凝聚力的一致性。在他看來，徹底採取西方文化，照樣可以有民族自信和民族意識<sup>②</sup>。

在十教授中，陶希聖最具有民族主義情緒。在他那裏，所謂本位文化，就是「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自由的爭鬥的文化」<sup>③</sup>。他認為，胡適批評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似乎是認為「半殖民地的中國人，不應當自己發現自己，不應當自覺地向前走一步」。並勸告說：「我不希望有權威的學者來相附和，但也不希望有權威的學者打消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民族獨立自主的思想。人應當不自驕，可也不要見人就跪！」<sup>④</sup>這是明顯地人身攻擊。

令人驚訝的是，胡適對來自陶希聖的這種民族主義指責，仍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擊。他把陶關注的民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問題，轉變為名詞概念和邏輯推理上的問題。他說陶希聖批評他的文章，是濫用名詞，概念混亂，思想籠統<sup>⑤</sup>，對此，陶希聖進行了反駁，但陶再次提出了反資本主義問題，並說對資本主義「歌頌是仍然不忍的」<sup>⑥</sup>。可胡對陶所作的最後答覆又一次表明，他還是沒有切中陶的要害。

對本位文化派的這種民族主義挑戰，西化派中只有王青雲反應敏感。他針對陶希聖對胡適的指責，公開站出來為胡適辯護。他說：胡適主張學習西方文化，正是「由他站在中國本位上的自覺，認清我們的文化不及世界文化的衷心主張。並不是如陶希聖先生說的否認中國本位的民族自覺。」至於說到對資本主義的模仿與鬥爭的關係，王青雲指出，只是對資本主義痛恨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模仿它的先進科學技術，以作為我們鬥爭的工具<sup>⑦</sup>。王青雲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它總算為西化派特別是胡適在民族意識上作出了表示。

胡適為甚麼不把他實際上具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覺作出充分的說明呢？正是缺少這一點，他就給人一種只知西化而不知民族意識的印象，使自己受到諸多誤解和批評。

胡適的教訓是深刻的。很明顯，近代以來侵略中國的是西方，而我們要學習的對象又正是西方。既要反對西方的侵略，又要學習西方文化，這就難免造成中國人的心理衝突，並很容易導致為了反對西方的侵略而連西方文化也加以排斥。在這種情況下，強烈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的人，就必須把面向西方與保持民族意識的關係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對待。但他們大都忽略了。這樣，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保守主義者所利用，使之成為排斥西方文化的便利工具，並一次次發難，使西化派受到傷害。

既要反對西方的侵略，又要學習西方文化，這就難免造成中國人的心理衝突，並很容易導致為了反對西方的侵略而連西方文化也加以排斥。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保守主義者所利用，使之成為排斥西方文化的便利工具。

## 註釋

- ①③④⑩ 馬芳編《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國音書店, 1936)。以下未註明論文出處者, 均出自此書。
- ②⑤⑫⑬⑳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 ⑥⑧ 胡適:〈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 ⑦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胡適論學近著》。
- ⑨ 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辯護〉。
- ⑪ 王西徵:〈中國本位文化要義〉。
- ⑰ 張奚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 ⑭⑯ 何炳松:〈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答胡適先生〉。
- ⑮⑱ 李劍華:〈試評胡適之「試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 ⑲⑳ 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
- ㉑ 范任:〈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問題〉。
- ㉒ 胡適:〈信心與反省〉,載《獨立評論》103號, 1934年6月3日。
- ㉔ 陶希聖:〈為甚麼否認現在的中國〉。
- ㉕ 陶希聖:〈對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幾點補充意見〉,《大學新聞周報》卷3期8。
- ㉖ 胡適:〈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獨立評論》153號。
- ㉗ 陶希聖:〈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獨立評論》154號。
- ㉘ 王青雲:〈談陶希聖先生的「為甚麼否認現在的中國」〉。

王中江 1957年生,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從事中國思想史,特別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以及中日近現代思想史的比較。著作有《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並發表有〈金岳霖的意念論之分析〉、〈論金岳霖的「理有固然,勢無必至」〉、〈嚴復與中國傳統〉、〈理解與攝取——嚴復倫理想闡釋〉、〈毛澤東文化取向論說〉等論文多篇。

## 討論摘刊

石元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講師) (1)本位派提的中國文化多是空話,沒有明確內容:胡適的提法較明確,例如很顯然的西化的內涵是英美化而不是德化,不過也還是流於口號式的宣示。(2)文化之間若沒有優劣可言,則便沒有「選擇」的問題,隨便一個都可以,於此本位派的論證較弱。此外,用科學作為選擇標準也有問題,事實與價值畢竟是兩個層次。而胡適用優勝劣敗來作為比評標準,其實會陷入循環論證中。(3)模仿與創造之前應有內部結構的存在,要模仿和創造便總得至少部分地放棄或改變原先的內部結構;要引入民主,自然要革新、淘汰舊觀念,否則只會被別人淘汰。